

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与反思

方长明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欧洲的多样性曾经为美国所羡慕,在几十年前,多元文化主义曾是欧洲各国政府倡导的新兴事物,但突然间成为各派政治人物抨击的对象,而且民众性排斥外来移民事件层出不穷,多元文化主义一时间危机四伏,大有彻底失败之势。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危机的实质是政党的政治需求与公众的经济需求相结合的结果。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攻击,混淆了文化多样性已成为事实及欧洲各国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具有残缺性这两个事实,而共生互补基础上的多元文化主义才是解决欧洲社会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关键词: 欧洲;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D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2)04-0015-06

多元文化主义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随后影响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80年代,传到西欧各国。战后移民促使西欧诸国向多民族社会过渡,各国政府先后出台政策应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多元文化主义一度是这些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但其发展一直波折重重,进入21世纪后,多元文化主义不断受到攻击。近年来,西欧多国首脑公开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曾为欧洲政治家们争相“追捧”的多元文化主义,一时间似乎成了过街老鼠,也促使人们思考其缘由。

一、移民与欧洲多元文化的形成

移民促使了欧洲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移民在欧洲历史上并不鲜见,正如尤根·尼尔森所说“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人员的流动,从而带来的在知识、艺术、思想、科技等方面的相互借鉴,欧洲文化将无法呈现出它现在的样貌。”^[1]但战后欧洲的移民有一个显著特点:移民不再局限于欧洲内部的移民,而主要是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这是欧洲历史上很少发生的。

这两类移民有很大的差异性:第一类移民,即欧洲内部的移民,他们和东道国居民在宗教信仰、语言以及文化上有着很多的共性。第二类移民,即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到来改变了东道国原有的民族成分,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宗教、语言

和文化习俗。

英国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居住的少数民族主要来自于加勒比海国家、亚洲以及非洲。法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来自北非。德国城市的少数民族则主要来自于土耳其和南欧^[2]。此外,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荷兰的少数民族则是由前殖民地加勒比地区以及摩洛哥和土耳其的移民构成。北欧诸国是伊拉克、伊朗、索马里以及埃塞俄比亚移民的主要目的地,雅典等希腊城市则吸纳了一大批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移民,里斯本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来自非洲和南亚的移民^[3]。

移民形成的民族多样性与东道国本身固有的民族多样性有着很大的差异。移民少数民族不主张任何领土要求,因此,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不可能采取地方分权或者自治的方式。此外,西欧主体社会倾向于将移民看成是具有特定社会经济身份的群体,在司法和政治上属于外国人或者非本国公民,他们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根基在东道国之外或者欧洲之外。因此,对多样性的认可成为西欧国家处理移民问题的主要途径。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提到政府的政策层面。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外来“客工”最终将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永久居住在东道国。

到了70年代,移民开始成为各国主要的政治问题之一。第一代移民往往以原居地居民的生活为参

收稿日期:2012-03-10

作者简介:方长明(1982-),男,安徽省桐城市人,中南民族大学讲师,主要研究世界民族问题。

E-mail: a-fangcm@163.com

照标准,因此,能接受比较低廉的待遇,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但这些移民的后代,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接受的是欧洲“自由、平等”的观念,要求与东道国同龄人享有相同的权利,然而主体社会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只是将他们看成“外籍劳工”的后代,因此,主流社会中的差别对待、居高临下的恩惠都激起了年轻一代的不满,民族关系趋向紧张。此外,随着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欧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失业状况日趋严重,各国政府很快开始限制外来人口的移入。但由于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移民基础,随之而来的家庭团聚移民又带来了大量新的外来人口,实际上使得移民数量有增无减。随着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放缓和失业率的增加,排外情绪和针对外来移民的袭击事件便不断增多。

到了8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开始进入各国政府的视线。其或是为移民少数民族争取平等公正的地位^[4],或是作为政府促进移民融合的工具,或是为了使民族冲突处于可控范围之内^[5]。

二、跛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奥斯陆和乌托亚岛发生的惨案是近年来欧洲反移民情绪的极端表现。每个有着大量移民的国家都在采取某种社会准则来同化移民,但由于政治结构的差异,各国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

1. 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2011年1月,英国保守党主席、第一位女穆斯林内阁成员沃西女男爵表示,从文化角度讲对穆斯林的恐惧心理已经被人们所接受。数十年以来,英国一直沿袭着多元文化的道路前进,民族多样性不仅受到普遍认可,而且在国家法律和社会政策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但是,尽管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容忍和尊重程度得到很大的提高,最根本的困境依然存在:一方面维持所有人的信仰自由,但同时又要求所有不同背景的人都遵从一套共同的法律体系,即便这套法律体系是根据多数群体的文化而制定的。

英国的移民问题主要是种族问题。主流话语中“移民”实际上指的就是“有色人种”(non-white person)。“这样一种表述,将有色人种和其他的人区分,从来没有运用到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波兰人身上,这也表明了普遍存在的种族偏见以及政治倾向”^[6]。尽管英国所有的主流政党都一直承诺要消除多民族社会中的民族差异。然而,由于害怕来自主体社会尤其是白人劳工阶层的抵制,政府在提高移民少数民族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方面一直难有作为。在国家层面只是提到机会均等,反对种族歧视,

而没有出台积极的政策以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英国内务大臣在宣布《1968年种族关系法案》时表示:这一法案关注权利的平等、责任的平等以及机会的平等,因此,这个法案是为全体国民的,而不是只为少数群体的。它的目标是保护社会的统一,反对社会的分裂,防止二等公民的出现^[7]。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已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住房和就业问题上,而现存的种族关系法案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1976年,一个新的法案出台,规定在一切公共生活中直接或间接的种族歧视都是违法行为,并在就业、教育、政府服务等方面做到种族平等。以教育为例,学校讲授文化和宗教课程,向穆斯林学生提供清真餐,认可每个学生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法律还规定,涉及种族歧视的犯罪在同类犯罪中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此外,各大城市建立伊斯兰中心,以供穆斯林移民从事宗教活动。政府还成立种族平等委员会以确保这些法律得以贯彻实施。

《1976年种族关系法》的颁布和种族平等委员会的成立,表明英国正积极融合少数民族,承认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它未能改变英国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的现状。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30%的雇主直接歧视黑人求职者^[8]。

由于地方政府采取比中央政府更为宽松的政策,允许少数民族文化自治,因此,英国的政策被称为多元文化政策。然而,英国没有在国家层面实施过明确的多元文化政策,中央政府更倾向于不干涉文化的方式。

2. 多元文化主义在法国。法国一直以自由、博爱和平等著称,但在多元文化发展的道路上也是挫折不断。20世纪70年代以前,法国处理移民问题的机构都是非官方机构,直到1974年才成立了官方的移民劳工部长。法国处理移民问题采取的办法不是追求平等的机会,而是将移民直接“嵌入(insertion)”法国社会,这一点和英国有很大的不同,英国致力于反对歧视并承认多民族社会的现实,而法国则忽视多民族社会的现实。此外,法国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的差异,而不是民族的差异。与“嵌入”政策相伴随的是要求移民回迁到原居地的政策,即“同化或者离开”。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移民的回迁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促进作用,但却恶化了政治氛围,它强化了“文化差异”以及“受欢迎的移民”和“不受欢迎的移民”的观念。移民逐渐被看成是“法国社会中的阿拉伯人问题”^[9]。

到 80 年代,法国的政策有所改变,政府承诺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认可并接受移民的现实以及文化的多样性。一些旨在缓和日趋紧张的民族关系的政策相继出台。这些新政策强调移民有权在法国生活和工作,不必被法国社会同化,同时在住房和就业方面不受到歧视性待遇,有权组建政治团体。

尽管法国政府很早就将移民的融合看成是国家的责任。为此国家成立了一系列处理移民问题的部门,涵盖了住房、城市发展、教育和宗教等方面。但是,政府不愿出台明确的承认少数民族的政策。1991 年发表的一份题为《关于融合的建议》报告充分表明了法国的政策。该报告表示:法国并不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但是传统的平等原则、承认个人权利以及非歧视性原则能够更好的保证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和机会,而承认少数民族则暗含着某种歧视性态度。融合的政策强调的是权利义务的平等,从而使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保证每一个人,不论其出身,都能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10]。

3. 多元文化主义在德国。战后德国对移民的安置和英法等国有很大的不同:雇主解决全部移民的居住问题。移民居住在劳工公寓或临时工棚中,他们和主体社会完全分开。这就意味着二战后头 20 年里政府完全不用考虑移民的融合问题。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随着家庭团聚移民的不断增长,德国政府才开始关注移民的社会问题。

德国关于移民融合的第一个政策框架是《1973 年移民劳工就业行动计划》,该计划的首要目标是移民的住房和教育问题。1975 年,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有关移民政策的指导方针。但此时德国政府强调的不是“融合或者回迁”,而是“暂时的融合然后回迁”,表明德国政府并不愿承认移民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11]。《1975 年外国人法》将居住许可与工作许可挂钩,但不提及居住权问题,这样就使那些在德国工作十余年的劳工也无法获得居住权。该法案还排除了移民的许多基本权利,如自由集会、结社权,自由迁徙权,自由选择职业权,自由选择受教育地权等。

80 年代,德国外来移民的境况进一步恶化。1982 年的选举中,各派政客在“同化或者离开”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对外来移民的态度也日益恶化。这种情绪在 1983 年得到进一步加强,政府出台了《促使外来工人回迁法》。但由于 80 年代移民的势头有增无减,政府不得不关注移民的融合问题。1991

年政府出台了新的外国人法,改善移民融合的条件,第一次提出在德国居住时间达到 8 年的外国人将获得“居住权”,但前提条件是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负担得起各项生活费用。

德国政府层面很少提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更多的是强调改善移民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不涉及文化方面的问题。事实上,80 年代的同化主义思想在《1991 年外国人法》里得到了明显的表现:融合作为适应德国社会的一个过程,要求外来人口首先要遵从德国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生活方式。但由于德国对待移民的首要态度是促成其回迁,因此,基于回迁目的上的文化保留政策客观上使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了文化自治的权利。

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之声

1. 英国的反对之声。英国是较为积极推动多元文化的国家。但是,反对多元文化之声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1968 年 4 月,保守党议员鲍威尔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反对移民的演讲。他指出,每年允许大约 5 万名移民进入英国,未来不久就将会有 350 万的移民及其后裔,这样的行为无异于自取灭亡。“当我向前看时,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像罗马人那样,我似乎看到了‘充满鲜血的台伯河’。”鲍威尔这篇被称为“血流成河”的演说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显示,82% 的人赞同鲍威尔的观点^[12]。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英国国内反对移民的情绪进一步高涨,《撒旦诗篇》一书的出版充分表明了这一倾向。9·11 以及 2005 年伦敦爆炸案之后,英国的多元文化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群众性的排斥移民事件不时爆发,而且逐渐上升为暴力冲突。与此同时,白人和有色人种居住区的分野也日渐明显。2004 年《卫报》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四成白人不愿与黑人和亚洲人做邻居。2006 年,英国女记者梅勒尼·菲利普所著的《伦敦斯坦》充分表明了英国民众对于穆斯林移民的看法。该书指出,英国政府“固执得近乎愚蠢地奉守文化多元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结果导致伦敦沦为恐怖主义的国际神经中枢”^[13],成了作者所说的“伦敦斯坦”。

因此,虽然英国一直以多元文化自诩,但右翼政党及本土居民对于移民少数民族的歧视,使其不能有效的融入主体社会当中,英国未能真正实施多元文化政策。

2. 法国的反对之声。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之前,来自北非的移民曾一度被看成是法国经济发

展的动力,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失业率的上升,这些移民被看成是导致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成了“危及法兰西国家认同”的群体。1981年,密特朗上台,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允许外来人口组织各种文化和宗教协会,实际上是承认了多元文化的存在。但到90年代,右翼势力不断增强,移民政策再次收紧。80年代中期进入公众视线的国民阵线是一个极右翼政党,该党宣扬强烈的排外思想,认为移民、尤其是来自马格里布的移民不仅无法接受法国的价值观念,而且威胁到法兰西国家的文化认同,接受多元文化无疑是危害国家利益。该政党在2002年的总统竞选中获得了17%的选票^[14]。

右翼势力的发展使得多元文化政策流于表面。比如提倡“语言的多样性”,其实质是为了便于这些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能方便的迁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一些很早就移民到法国的人,他们的后代在法国出生,成长,接受教育,已经不认为他们和法国人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他们就是法国人、欧洲人,但是主体社会仍将他们看成是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后裔,将他们置于法国主流社会之外,群众性的排外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3. 德国的反对之声。德国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德国政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引入移民,将他们当作“外籍劳工”。但德国的法律和政策明确表明,德国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也就是向外来民族融入德国社会竖起了一堵高墙^[15]。结果,德国政府并没有为移民创建一个使之能融入其中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德国未能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不仅只是一个政策问题,而且还在于德国对“文化”和“多元文化”的不同理解。不同于英语和法语,德语中“多元文化主义”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消极的涵义。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奥斯瓦德·斯宾格勒以及托马斯·曼用“文化(Kultur)”来特指在智力、精神、艺术以及宗教上的社会价值。对于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来说“文明(主要是欧洲的文明)”是文化纯洁性衰落或丧失的结果。而文化却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某种更为深远的东西,某种只能从一个国家的“精神中”才能被发觉的东西。由于这样一个对文化的定义,从而实际上排除了非德裔人参与德国文化的可能性。

在德国统一前,多元文化一直被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所否认。直到1989年,法兰克福才设立了

“多元文化事务处”(OMCA——Office for Multicultural Affairs),虽然该机构对于推动多元文化思想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未能有效改变移民的处境及缓和本土居民的排外情绪。直到2000年,外籍劳工及其后代都不能获得德国的公民权。也就是说,德国政府以及大多数民众并不希望与移民“和谐的生活在一起”。相反,他们希望这些移民能卷起铺盖回到原居地。在这种思维之下,德国基本上沿袭着其长久以来的应对多样化的政策: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历来都不承认移民的重要作用,只给予那些能证明自己是德国人后裔的移民以公民权。此外,2007年的《新移民法》更是规定移民必须接受德语课程学习,并通过考试,对于不合格者将削减其社会救济金。

德国社会也存在着普遍的反对移民的浪潮。2010年8月,前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蒂洛·萨拉辛在《德国自我毁灭》一书中指出,土耳其、库尔德以及阿拉伯移民正在破坏德国繁荣的基石,随着德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些外来移民正在不断取代德国人口,但这些移民往往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在社会脱节程度、犯罪率以及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性上远远高于德国本土居民^[16]。萨拉辛甚至用“遗传缺陷”来形容来自中东的移民。虽然他因过激的观点和言论而被迫辞职,但此书却受到热捧,民调显示,大约2/3的德国人认为他有权表达他的思想,有1/3的人表示赞同他的观点。

这些都表明了反对移民、反对多元文化在德国已经不仅仅只是政府行为,而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危机的实质与反思

2010年10月1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演说时称,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生活的努力“彻底失败”,让德国人和外国劳工“快乐地并肩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2011年2月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德国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表示“在国家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则之下,我们鼓励不同的文化独立发展,甚至独立于主流文化,导致一些年轻的英国穆斯林走向个人极端主义。现在是将过去的失败政策翻过去的时候了。”1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接受电视台访谈时宣布法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同年7月22日,挪威年仅32岁的种族主义者布雷维克上演了惊人的杀人秀,在其长达1500页的《2083欧洲的独立宣言》中,他提出要清除穆斯林,要消除多元文化带来

的“弊端”。

1. 在政治形势日趋右倾的欧洲,出现了多国首脑集体性的否定多元文化政策的现象,其实质是政党的政治需求与公众的经济需求相结合的结果。首先,经济因素是产生文化排他性的根本原因。当经济繁荣发展,每个人都能获得工作机会的时候,民族的差异性往往显现不出来,但是,当失业率不断攀升而且经济发展前景黯淡之时,不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凸显出来。本土居民认为外来人员抢走了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而且,在本已严重的就业压力之下又不断有新的移民的到来,无疑进一步恶化了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关系。“竞争者”的身份是移民被排斥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文化排他性受到了文化差异性的支持。欧洲国家否定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认定外来移民无法有效的融入主体社会当中,无法接受主体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且这里所针对的外来移民都是来自欧洲以外地区和国家的移民,欧洲内部的移民没有受到排斥。这些来自亚、非、拉地区的移民不论在语言、宗教还是生活习俗方面都与欧洲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为排他性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持,从而使排斥移民少数民族上升到保护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高度。

最后,当这种保护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公众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时候,便成为各国政客的政治工具,于是出现了多国首脑及右翼党派的政治秀。无论是在英国、法国、德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在各政党领袖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时候,并非是在引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而只是对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的一种反映。

一方面,各国政党可以通过否定多元文化主义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在欧洲,各国的右翼政党已经通过保守的政策获得了大批的支持者。如法国的国民阵线,英国的不列颠国家党,比利时的弗拉芒利益党,荷兰的自由党,瑞士的人民党,奥地利自由党和奥地利未来联盟,匈牙利的尤比克党,丹麦的人民党,瑞典的民主党等。这些党派通过宣扬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穿着套袍、佩戴头巾以及限制移民等保守政策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迫使各国执政党也纷纷对多元文化主义表态。

另一方面,攻击多元文化主义还可以用来掩盖自身政策的失误。否定多元文化不仅具有模糊性还具有误导性。欧洲各国未能有效地处理外来移民的社会地位以及与本土居民的关系问题,引发了一系

列的社会矛盾。人们无法让卡梅伦承认英国的种族偏见、移民政策以及基于信仰的学校教育是导致外来少数民族难以融入英国社会的主要原因,但是很容易让他说:我们过去的政策有失误,让我们纠正它吧,让我们都成为英国人吧。从而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移民身上。而对于萨科奇和右翼势力法兰西国民阵线来说,谴责穆斯林在公开场所做礼拜要比腾得出地方修建清真寺容易得多。

2. 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攻击混淆了两个事实。第一,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事实。在各国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时候,这个“文化”的定义实际上是建立在某种抽象的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概念和特征只能通过历史的传承才能被感知,因此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但是,战后欧洲多国鼓励外来劳工移民,来自亚、非、拉的移民出现在整个西欧范围之内。结果,人们在以往只有基督教堂的地方看到了许多清真寺,在以往只听得到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地方听到了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因此,不论多元文化主义是否遭到否定,此时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事实。

第二,欧洲各国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具有残缺性。20 世纪 70 年代,西欧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外来移民意欲永久的留住在这些国家,于是东道国开始采取一些政策为移民提供“合理的设施”。但这些都只是实用主义的举措,他们既没有促使移民融合的想法,也没有保护移民的文化独立的想法。而作为第二代或第三代的移民,尽管他们出生在欧洲,但仍然被看成是外国人。他们没有被围墙隔离,可以自由的行动,可以说流利的英语或者德语,但是他们仍然被周围的人所拒绝,从而使他们变成了失去社会和文化根基的孤独个体,忍受着“去疆域化”^[17]的痛苦。因此,问题的出现并非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而是多元文化政策残缺性造成的。

3. 共生互补基础上的多元文化主义是解决欧洲社会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由于多样性的存在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攻击无益于解决主体社会与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流动性的加强,文化纯粹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已不可逆转。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在其著作《文明史纲》中所说“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是许许多多世纪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然而,必须承认,今天,一个特定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方面第一次为世界上所有的文明自

愿地接纳,现代通讯的速度第一次如此地促进了它迅速而有效地传播。”^[18]对作为政策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其实质是排斥民族、宗教、语言以及经济的多样性,它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这里“共生互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共生单元间互为依存,互利共赢。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19]。“共生”为和谐提供了前提,“互补”为发展增强了动力。承认并尊重多元文化的发展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缓和并化解社会矛盾,这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口现状及发展趋势预示着移民将是未来欧洲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唯一途径。在移民为欧洲经济作

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尊重其文化并给予其平等发展的机会是解决欧洲社会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多元文化的实质不是一种文化拥有优于另一种文化的特权,而是平等的对待所有的文化,将其视为更大的社会的一部分,这些文化因素只会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而不会对社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都应该抛弃自身文化中的狭隘因素,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多民族共生,不仅不会导致文化根基的丧失和社会的分裂,相反能促进文化上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 [1] Jorgen Nielsen. Muslims in Western Europe. Islamic Survey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2: 151.
- [2] Barbara Harff, Ted Gurr. Et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M]. Westview Press, 2003: 83.
- [3] Moshe Semyonov, Anya Glikman, Maria Krysan. Europeans' Preference for Ethnic Residential Homogeneity: Cross - National Analysis of Response to Neighborhood Ethnic Composition [J]. Social Problems, 2007, 54(4).
- [4] B. Barry. Culture and Equality: An Egalitarian Critique of Multiculturalism [M]. Oxford: Blackwell, 2001: 217.
- [5] J. Rex, B. Drury. Ethnic Mobilization in a Multi - cultural Europe [M]. Aldershot: Avebury, 1994: 11.
- [6] Layton - Henry. 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Immigration, Race and Race Relations in Post - War Britain [M].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2: 73.
- [7] Layton - Henry. The Politics of Race in Britain [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4: 134.
- [8] 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 Review of the Race Relations Act 1976: Proposal for Change [J]. CRE, 1985.
- [9] Russell King. Mass Migration in Europe. The Legacy and the Future [M].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3: 114 - 115.
- [10] Crawford Young. Ethnic Diversity and Public Policy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155.
- [11] S. Castles. The Guests Who Stayed - The Debate on Foreign Policy ' in the German Federal Republic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85(19).
- [12] Dilip Hiro. Black British White British: a History of Race Relations in Britain [M]. London: Graft on Books, 1991: 246 - 248.
- [13] Melanie Phillips. Londonistan [M].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6.
- [14] Ronald Koven. Muslim Immigrants and French Nationalists [J]. Society, 1992(29).
- [15] Barbara Harff, Ted Gurr. Et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M]. Westview Press, 2003: 83.
- [16] Thilo Sarrazin. 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 [M]. Deutsche Verlags - Anstalt, Auflage, 2010: 22.
- [17] Jocelyne Cesari. Islam in Europe: Diversity, Identity and Influe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54 - 55.
- [18] 布罗代尔. 文明史纲 [M]. 肖昶, 等,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5.
- [19] 许宪隆, 张成. 文化生态学语境下的共生互补观——关于散杂居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视野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5).

(责任编辑 程 莘)